

再谈旧石器类型学

陈 淳

(上海控江路 1732 号 607 室, 上海 200092)

1 类型学的作用与博尔德类型学

对于考古类型学的概念问题, 笔者曾撰文作了探讨(陈淳, 1994)。在此想进一步就类型学的作用以及旧石器类型学的发展作一介绍。

分类可以说是旧石器研究最基本的步骤, 即对石制品进行鉴定、命名、归类和描述(Hill and Evans, 1972), 然后在结论部分作简单的总结和必要的解释。然而有的学者在进行分类时, 仅仅是将其看作是一种例行的程序, 自己可能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目的。而有的学者将类型学看作是考古学的主要方法, 以为类型学能解决大部分考古学问题, 如断代, 分辨文化关系, 了解经济形态甚至社会演变。这种类型学分析由于目的过多, 以至于证据不足而无法达到作者的愿望。

亚当斯等(Adam s and Adam s, 1991)认为类型学的功能有二: 一是基本功能, 二是判断的工具。基本功能是指对遗存进行描述、比较和分析, 并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封闭型分类, 即只适用于一组采集品, 所以只是描述性的, 其作用是将无法逐一介绍的器物归类而简化描述。另一种是开放型分类, 即所确立的分类标准必须兼容时空分布不同的采集品, 因此这种分类可以用来作比较分析。作为判断的工具, 类型学可以用来对遗址和地层断代和分辨民族群体。在断代分析中, 类型概念类似于古生物学中的“标准化石”; 而在文化分析中, 类型概念是民族群体身份的标志。

由于一种或一组器物具有种种不同的特征, 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特征, 因此分类过程的关键在于特征或标准的遴选与取舍。在文化历史学分析中, 时代和文化关系常是首要关注的问题, 所以分类过程常常着眼于最具时代和文化特点的特征, 而尽量排除纯粹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特征。

虽然许多考古学家认为类型学具有多种目的和作用, 然而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来说, 类型学还具备一个更为基本的功能, 即用来帮助浓缩信息, 并提供一种适于理解和交流的统一专业词汇表(W hittaker, 1994)。可以设想, 如果两位学者讨论的类型不是以同一原则命名的器物, 他们之间的交流就难以进行。

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 博尔德的分类法(Bordes, 1961)在西方得到较广的应用。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如东非、中国、日本, 旧石器分类另有不同的标准。

50 年代之前, 旧石器类型学的进展还比较缓慢。分类和描述常因人而异, 因此在理解和比较研究中造成很大的困扰和不便。60 年代以来, 博尔德等人在类型学上做了许多工作。博尔德最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统一的分类标准, 即根据器物形态的数理关系和石片标志 (landmark) 来确立和划分类型。下面简要介绍博尔德对几类主要器物的分类原则。

博尔德在对手斧或两面器 (biface) 进行分类时, 确立了几项测量标准和方位:

- (1) 长: 平行于器物对称长轴的最长距离。
- (2) 最大宽: 垂直于长轴所测得的器物最大宽度。
- (3) 沿长轴从底缘到最大宽的距离。
- (4) 长轴中点宽。
- (5) 器物最大厚。

根据以上标准和方位, 博尔德求得以下几项分类数据:

- (1) 最大宽位置: 以长除以从底缘到最大宽的距离计算。
- (2) 边缘圆度: 以长轴中点宽除以最大宽来表示。
- (3) 尖形参数: 以长轴四分之三处宽 (从底缘量起) 除以最大宽来计算。
- (4) 长短参数: 长与最大宽之比值。当值大于 1.5 时可视为长形手斧。
- (5) 扁平度: 最大宽除以最大厚之值。博尔德认为此值超过 2.35 即为薄型手斧, 否则为厚型手斧 (图 1)。

博尔德先根据扁平度将手斧分为两大类: 薄型与厚型手斧。在薄型手斧中, 他以手斧最大宽位置 (Y 轴) 和边缘圆度参数 (X 轴) 建立分布图表, 然后在图表上的分布区分出 4 类手斧: 三角形手斧, 亚三角形手斧, 科迪福姆型手斧和椭圆形、盘形及利芒德型手斧。在厚型手斧中, 博尔德进一步分出了阿布维利手斧, 不完整手斧 (partial biface), 石镐以及似石核手斧。

在对石片石器的分类中, 博尔德确立了以工作缘位置与石片轴的关系来作为类型划分的依据。完整的石片一般有两条长轴, 一是石片轴或技术轴, 它是由打击点出发与台面垂直而延伸的一条直线, 并将打击泡一分为二。另一条是石片长轴或形态轴, 是石片两个最远点之间的距离 (图 2)。

石片轴是石片和石片石器描述分类的标志。石片的长应以石片轴而非石片长轴的长度来表示, 石片宽应以垂直于石片轴的最大宽来表示。

石片石器的分类和命名以石片轴为依据。例如, 边刮器必须是指工作缘的走向大致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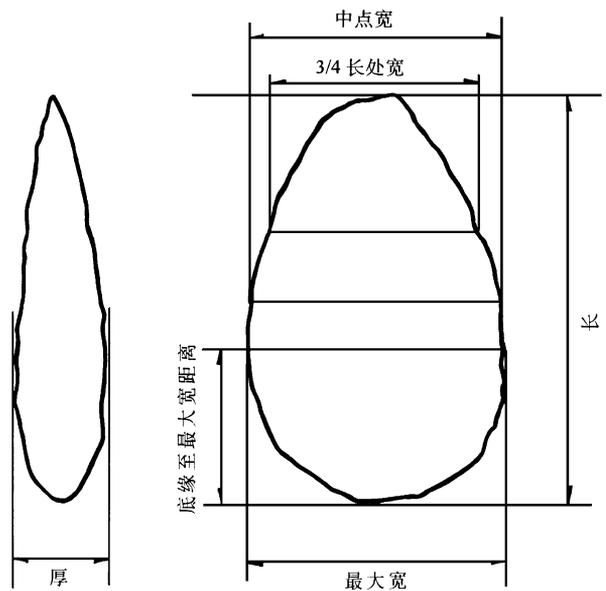


图 1 手斧的测量

(依 Bordes, 1961; Debenath et al,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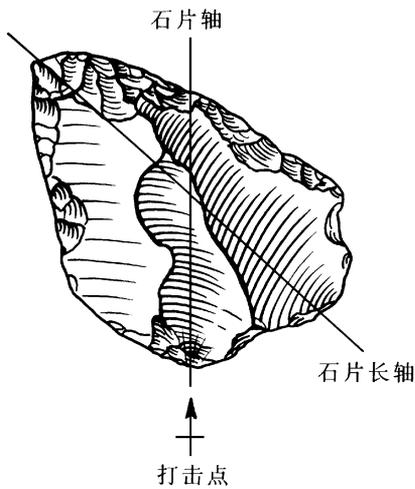


图 2 石片的两条轴
(依 Debenath et al , 1994)

石片轴一致或平行。横刃刮削器 (transverse scraper) 其工作缘与石片轴相交角度应大于 45 度。端刮器的工作缘必须位于石片或石叶的尾端。

尖状器是指一件石片或石叶沿两侧缘修整而于尾端形成一尖的器物。如果一件石片沿一侧缘和横缘修整而聚成一尖, 虽酷似尖状器, 但分类上归于聚刃刮削器 (convergent scraper)。

此外, 博尔德还确立了器物命名的几项原则。比如, 不同特征或加工形状出现于同一工作缘上, 应以打击点为起点依次命名如直凹刃边刮器。在多用途或多工作缘工具的命名上, 典型特征比非典型特征主要, 精致加工比随便加工主要, 罕见特征比普通特征主要。比如一件普通边刮器上有仔细加工的雕刻器刃口, 应命名为雕刻一边刮器。

目前对博尔德类型学的批评主要是: 1. 主观性。分类基本上着眼于典型标本, 未考虑器物形态渐变的可能。2. 石器的特征可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原料、用途、形制、技术和再加工, 而在分类中这些特征均被作为形制特征来考虑 (参见 Debenath and Dibble, 1994)。

尽管存在缺陷, 博尔德类型学仍不失其实用价值。科学分类是了解并着手分析一组石工业的第一步。今天, 分类的结果已不是分析研究的结果, 而是进一步提炼各种史前文化信息的基础。

2 莫斯特文化类型的争议

博尔德认为, 类型是工业、文化组合和发展阶段的特点。它们常作为一批配套工具以一种有规则的比例存在于这些工业组合之中。因此分类学必须以质量 (类型) 和数量 (比例) 来考虑它们的分布频率和变化 (Bordes, 1969)。

1948 年, 博尔德在观察法国莫斯特文化的类型频率分布时发现, 不同工业组合中不同类型的比例差别十分明显。因而意识到有可能存在以不同类型结合所构成的不同莫斯特文化类型或传统。通过数理统计, 博尔德分辨出 4 类不同的莫斯特文化类型, 并认为它们代表了 4 类相对独立的民族群体。下面是 4 类莫斯特类型的特点。

(1) 典型莫斯特文化: 含大量加工仔细的莫斯特尖状器, 相当比例的刮削器 (25% — 55%), 基纳型 (Quina) 刮削器少, 手斧少, 背石刀少, 勒瓦娄哇石片数量不等。

(2) 夏伦 (Charentian) 或基纳-费拉西 (Quina-Ferrassie) 型莫斯特文化: 含高比例的基纳型刮削器 (50% — 80%) 和其他莫斯特类型少见的器物如厚刮器、凸刃刮削器和横刃刮削器, 手斧少或不见, 无背石刀, 许多刮削器通体加工, 含隆脊形或鼻形端刮器, 相当多的拉克当凹缺器, 锯齿形器少, 偶然有勒瓦娄哇石片。

(3) 锯齿型莫斯特文化: 含高比例的锯齿形器 (35% — 55%), 凹缺器多, 无典型手斧, 无典型背石刀, 尖状器少或不见, 刮削器少 (5% — 25%), 勒瓦娄哇技术不明显。

(4) 阿休利传统莫斯特文化:

类型A: 含手斧(8%—40%, 一般在10%—15%), 相当多的边刮器(20%—40%), 较多的尖状器、凹缺器和锯齿形器, 相当数量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类型如雕刻器, 端刮器, 截头石叶, 背石刀精致, 有勒瓦娄哇石片。

类型B: 含少量手斧(2%—8%, 一般在4%—5%)且质量退化, 锯齿形器和背石刀发达, 相当数量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类型如端刮器, 雕刻器, 钻, 截头石叶, 一定数量的勒瓦娄哇石片, 边刮器少, 无基纳型刮削器。

这4类莫斯特文化自玉木冰期开始时出现, 互相平行发展而延续了漫长的地质年代。这已由地层学和孢粉学所证实(Bordes, 1968; Bordes and de Sonneville-Bordes, 1970)。

在1966和1969年两篇文章中, 宾福德夫妇对博尔德的4类莫斯特文化类型的划分提出不同的看法(Binford and Binford, 1966, 1969)。他们根据民族考古学的观察提出, 原始群的生活常以性别和年龄而从事不同的劳动分工, 因此常常以生活群和工作群的方式聚合分散。虽然我们不清楚史前人类的聚散方式, 但是这种以家庭和生产为生存单位的不同组合方式应该也存在于史前期, 而这种不同组合关系也一定会反映在不同遗址所遗留的工具组合之中。猎物, 植物, 合适的栖居地点, 以及石料的分布会直接影响到一个社会不同群体所从事的不同活动。由于食物资源在一年中会因繁殖周期或季节出现波动, 原始群也会随之变换他们的觅食方式。这种由不同活动所导致的特定栖居地点的选择和利用, 构成了考古研究中居址类型和居址系统的概念。

宾福德夫妇提出了旧石器时代3类基本的居址类型:

(1) 基本营地(Base camp)是一类栖居时间较长的大本营。在这类居址中主要从事食物处理和工具生产以及其他相关的活动。

(2) 工作营地(Work camp)是一类短期或季节性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 或开采石料的栖息营地。这些地点留下的工具主要反映从事特定的活动, 但是因为使用时间较长, 也应留有少量食物加工和工具生产的证据。

(3) 临时营地(Transient camp)是狩猎采集群流徙途中过夜或歇足的营地。这类地点留下的工具较有限, 仅仅为一些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器物。

根据这一构思, 宾福德夫妇试图从不同活动所需的配套工具来确定不同的因子(factors), 并以此来分辨遗址的活动性质。他们挑选了3个遗址, 以色列的Shubbabiq, 叙利亚的Jabrud和法国的Houpeville。他们按地质学和社会学常用的因子分析方法, 借助于电脑进行统计, 分辨出5类因子:

因子1: 含16种工具类型。包括高比例的钻, 端刮器, 不典型雕刻器, 自然背石刀。这类因子主要代表基本营地的活动。

因子2: 含12种工具类型。包括3种矛头(勒瓦娄哇尖石片, 修整的勒瓦娄哇石片和莫斯特尖状器), 各种刮削器, 各种用途的狩猎屠宰工具。这类因子代表从事狩猎屠宰活动。

因子3: 主要为切割工具。包括各种背石刀, 自然背石刀, 勒瓦娄哇石片, 未加工石叶。这类因子主要代表从事食物加工活动。

因子4: 主要含锯齿形器, 凹缺石片, 陡直加工的刮削器。宾福德认为这些工具主要从事植物处理活动。

因子5: 含长形莫斯特尖状器, 典型雕刻器, 未加工石叶。这类因子代表比因子2更为

独特的狩猎屠宰活动。

根据分析结果, 宾福德夫妇认为 Shubbabiq 是一处基本营地, Jabrud 是一处工作营地, 而 Houppesville 环境与近东两处遗址差别太大, 工具组合酷似 Shubbabiq, 但是因子分析结果却不同, 所以难下定论。为此, 他们认为博尔德的四类莫斯特文化代表了不同活动营地中的工具组合差异而非文化传统不同。

杰利内克 (Jelinek, 1976) 指出了上述结论中的几个主要弱点: 1) 未将基纳型刮削器这一重要变量考虑在内。2) 统计工具比例时与原样本比例有出入。3) 一些采集品出自混杂的地层堆积。4) 用博尔德类型名称来确定器物用途是有问题的。5) 并未介绍具体样品和分析程序, 所以别人无法再研究以作检验。

博尔德对宾福德夫妇的看法也作了反批评, 他指出:

1) 不考虑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巨大差异, 将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与现代土著相比是危险的。法国南部从来不像拉布拉多 (魁北克北部)、澳大利亚和卡拉哈利沙漠。

2) 许多莫斯特遗址的沉积相当厚, 从上到下并无明显变化, 表明是连续栖居的。虽然我们可以想象莫斯特人的季节性活动有别, 但是看来他们在一些洞穴中是长年栖居的。

3) 法国旧石器时代很少有北美常见的那种以屠宰几头或一群野牛为主的工作营地。

4) 特定的工作营地在法国不多, 无论是旷野遗址还是洞穴, 大多兼有工具生产和使用的证据。

5) 宾福德夫妇的因子分析是有问题的, 比如不典型雕刻器被归入因子 1, 而典型雕刻器被归入因子 5, 其实它们是同一类工具。

6) 有证据表明, 许多不同活动是在同一个遗址内进行的, 而不是在不同地点从事的。

7) 旷野遗址和洞穴从理论上是从事不同活动的地点, 但是有时所含工具十分相似。而两处活动性质应相似的旷野遗址有时出土的工具差别很大。

博尔德还认为原始社会的文化具有很强烈的保守性, 文化传统比基因更难交流。如果一名基纳型莫斯特文化的妇女入嫁阿休利传统莫斯特文化的群体, 在她有生之年可能会不断生产基纳型刮削器, 但是她的女儿可能不会再这样做。这也许是为什么阿休利传统莫斯特文化组合中偶有基纳型刮削器的原因 (Bordes and de Sonneville-Bordes, 1970)。

目前关于莫斯特文化类型的争论并无完美的结论, 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然而作为旧石器研究中一个深具影响的问题, 它表明在观察一批石工业组合时, 采用不同的类型学对工具的多样性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一争论激励人们开始重视影响石工业的各种因素, 标志着旧石器考古的一个新的起点。

3 类型学分析的新视野

杰利内克 (Jelinek, 1976) 对包括博尔德分类法在内的旧石器类型学有一段中肯的批评, 指出分类中形制和功能两类信息的混淆, 使得类型学在从形制或功能上来作解释均不适当。而器物最终式样差异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并可能与其原来式样十分不同。然而长期以来这种式样上的不同均被视为形制表现来处理。

当前旧石器研究的发展, 表现在对影响石制品的各种因素的重视, 特别关注石制品生产和用途方面的信息, 而对形制意义上的文化关系判断持较谨慎的态度。

在此, 笔者想介绍一项类型学的实例分析, 是美国考古学家劳伦斯·基利 (Keeley, 1988) 对欧洲马格德林文化 3 组石工业的比较研究。作为一名微痕分析专家, 基利在作类型学比较的同时, 还从石料, 拼合, 微痕的角度来了解类型和打片方法异同的原因, 其结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3 处遗址分别是法国的 Verberie 遗址, 西班牙肯塔布利亚地区 (Cantabria) 的 Rascano 和 El Juyo 遗址。Verberie 是一处河流阶地遗址, 石制品围绕灰坑分布, 栖居时间短, 是用于跟踪驯鹿的临时营地。热释光断代为距今 13 300 年。Rascano 是一处小型洞穴遗址, 碳-14 年代测定介于 16 433 与 15 173 BP 之间。El Juyo 是一处中大型洞穴遗址, ^{14}C 测定为 14 400 BP。这 3 处遗址出土的石工业都含有独特的马格德林石叶加工技术和大量的背石刀。

根据类型学分析, 3 组石工业的异同表现为:

- 1) 肯塔布利亚两遗址端刮器数量多。
- 2) 肯塔布利亚两遗址含高比例的陡刃刮削器, 但是不见于 Verberie。
- 3) Verberie 含许多大型石钻, 但是不见于肯塔布利亚两遗址。
- 4) Verberie 的雕刻器主要为直刃或斜屋脊形, 而肯塔布利亚两遗址主要是屋脊形。
- 5) 相比之下, 肯塔布利亚两遗址雕刻器较少。
- 6) Verberie 不见石核式雕刻器。
- 7) 肯塔布利亚两遗址含砸击法产生的裂片 (Piece esquilles), 但是不见于 Verberie。
- 8) 肯塔布利亚两遗址凹缺器, 锯齿形器和边刮器较多。
- 9) 肯塔布利亚两遗址含较多的 Dufour 式小型琢背石刀。

基利还列举了 3 项技术上的差异:

- 1) Verberie 工具的荒坯主要是石叶和小石叶, 而肯塔布利亚两遗址均为石片和石核。
- 2) 肯塔布利亚两遗址的工具尺寸明显较小。
- 3) 肯塔布利亚两遗址, 特别是 Rascano 采用砸击技术, 含有高比例的裂片, 并与有麻点凹坑的条状石锤石砧共生。

根据工具使用痕迹分析所知, 这 3 组工业功能差异不大, 主要从事高频率的干皮和新鲜皮革加工和较低频率的骨角器加工。El Juyo 可作为一处基本营地, 而 Verberie 和 Rascano 为两处狩猎营地。

基利认为两地 3 处遗址石工业的类型技术差异主要是石料造成的。法国 Verberie 遗址附近质地很好的火石在白垩纪地层中广有出露。根据碎片拼合显示, 原料多为大型的火石块状结核。但是在肯塔布利亚地区, 优质火石相对很少, 常见的是较小的磨圆的火石卵石, 这些石料与较为粗劣的打片技术——砸击法共生。在 El Juyo 偶然也能获得优质火石, 所以也能生产出大型石叶。这两个地区石料的质地和大小, 决定了它们之间器物形制和打片技术上的差异。而从微痕分析所知, 这三组石工业的功能差别不大, 可以被视为典型的马格德林文化石叶和背石刀等工具的使用和加工。除了 Verberie 遗址存在一些大型石钻可能被看作是一种独特之处以外, 其他方面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4 小 结

综上所述, 旧石器的类型学分析经历了从分类不规范到规范, 进而采用多种方法来充分了解石工业性质, 以弥补纯类型分析不足的发展过程。

目前我国旧石器类型学研究尚不规范, 且不少学者仍相信, 只要遵循某种范例所规定的分析程序和步骤, 他的分析就是科学的, 他所作的结论也就基本是正确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 半个世纪以来史前研究范例的转移已经改变了过去较为单一的文化历史复原模式。

长期以来, 旧石器分类基本上采取了与陶器分类相仿的形态鉴定原则, 尽管一些类型采用了功能性名称。这种形态或式样上的异同, 不管其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一般都被当作形制特征来判断文化关系。实质上, 打制石器和制作陶器不同。石头是一种可塑性很差的原料, 工匠只有从长宽厚 3 个方位来设计他的产品, 且成品特征受原料质地、尺寸及工匠自身所掌握的技艺水平的限制, 一些成型特点的造就不能完全处于工匠主观控制之下。因此, 打制石器的类型分析具有其他器物如陶器、青铜器, 甚至磨光石器所没有的难度。

为了使我国旧石器分类规范化, 博尔德类型学的一些分类原则是值得借鉴的, 因为这些原则今天仍被许多欧美史前学家所认可和采纳 (Debenath and Dibble, 1994)。采用统一的分类标准, 可以使这门学科的描述、分析、比较和交流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有了共同的语言和基础。然而, 就目前的发展和现状而言, 这种类型学分析已有了更高的要求, 必须同时关注石料、技术、功能和形制四方面的信息。如果要用类型学来探讨文化传统演变和区域文化差异, 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的信息也是必不可少的。旧石器考古需要类型学, 但是已不再局限于类型学, “各种证据的线索必须汇集起来, 以了解石工具并最终能了解生产和使用它们的人类已逝的生活” (Whittaker, 1994)。

参 考 文 献

- 陈淳. 1994. 谈旧石器类型学. 人类学学报, 13 (4) 374- 382.
- Adams YW, Adams EW. 1991.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and Practical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nford LR, Binford SR. 1966.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functional variability in the Mousterian of Levallois fac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2 (2) 238- 295.
- Binford SR, Binford LR. 1969. Stone tools and human behavior. Scientific American, 220 (4) 70- 84.
- Bordes F. 1961. Typologie du Paleolithique ancien et Moyen. 2 vols. Memoires de l'Institut Prehistoriques de l'Universite de Bordeaux I, Bordeaux Delmas.
- Bordes F. 1968. The Old Stone Age.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New York, Toronto: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 Bordes F. 1969. Reflection on typology and technology in the Paleolithic. Arctic Anthropology, 6 1- 29.
- Bordes F, de Sonneville-Bordes D. 1970. The significance of variability in Paleolithic assemblages. World Archaeology, 2 (1) 61- 73.
- Debenath A, Dibble HL. 1994. Paleolithic Typology. 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 Hill JM, Evans RK. 1972. A model for classification and typology. In: Clarke D ed. Models in Archaeology. London: Methuen, 231- 273.
- Jelinek AJ. 1976. Form, function, and style in lithic analysis. In: Cleland C E ed. Cultur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 33.
- Keeley LH. 1988. Lithic economy, style, and use: A comparison of three late Magdalenian sites. Lithic Technology, 17 (1) 19- 25.
- Whittaker JC. 1994. Flintknapping: Making and Understanding Stone Tool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